



上海晨光書店發行

陳伯達著

抗戰中新人生觀的創造

——民國精神總動員的認識——

陳伯達著

上海晨光書店發行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七

- 一 精神的力量變為物質的力量…………… 一
- 二 近代中國民族的覺醒…………… 四
- 三 沒有民族的自由，毋寧死！…………… 六

第二章 中國民族的本體…………… 八——一六

- 一 中國民族的本體——中國人民…………… 八
- 二 中國是中國人的國家…………… 一〇
- 三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與人民至上的統一…………… 一三

第三章 中國民族的歷史運動…………… 一七——五〇

- 一 中國人歷史的光榮、停滯、不幸與復興…………… 一七

二	兩極相逢與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基本動力	二二三
三	抗戰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道路	三〇〇
四	抗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道路	三三三
五	中國的改造與展望	三九九
六	民衆與英雄	四五

第四章 近代中國人應有的哲學觀念與

道德觀念	五一——六一
------	--------

一	爲公的哲學代替爲私的哲學	五一
二	爲公的道德代替爲私的道德	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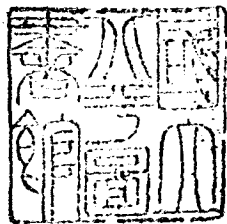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結論	六一——六六
-----	----	--------

集體努力與艱苦奮鬥決定中國的歷史	六二
------------------	----

第一章 緒論

一 精神的力量變為物質的力量

一個民族精神上的振作或萎靡，是民族強盛或衰微的反映。觀察一個民族的發展是在向上或向下，是在向前或退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那民族在精神上的各種複雜表現，看出其一定的徵候。如果一個民族是陷在滅亡危險的逆境，則這個民族在精神上的表現，尤為是否能夠獲救的徵候；這個民族如果能夠在精神上掃除一切腐敗、貪婪、自私自利和苟且偷生的習氣，廢除一切束縛精神的鎖鑰，臥薪嘗胆，大膽有為，而又具有合作的真正理智和雅量，則這個民族雖陷在滅亡危險的逆境，終必不可滅亡；相反，這個民族如果在精神上繼續沉迷荒淫，玩物喪志，為私大於為公，偏見重於理智，空談代替實際，對內勇如猛虎，而對外却怯如小鼠，則這個民族不管其「天賦獨厚」，或歷史悠久，就時常難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一定條件下，精神確實是一種大力量。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這裏所謂「人和」，事實上也就是關於精神的力量，而他這段話，正說明了歷史上一切弱戰勝強和革命戰勝反革命的戰爭之祕密，同時也正是給了一切在革命戰爭中求勝利者以教訓。精神之所以能成爲真正的大力量，一定是當其和大衆相結合的時候，是把握了大衆的時候，是和民族、人民的利益相結合的時候，是把握了民族、人民的利益的時候；也就是這樣，才能表現爲「人和」。「精神一旦把握了大衆，就變成物質的力量」，而當其一旦變成物質力量的時候，就可能成爲旋乾轉坤的力量。在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日子裏面，在當廣大民衆突然用迅雷暴風的英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上，爲正義和自由而奮鬥的時候，我們就真正地看到了這樣的規模，我們就真正看到了精神力量的偉大。

精神力量在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日子裏面、所以能表現那樣震撼天地的偉大，

其主要的真實，必然是解放的。祇有解放的精神，才能吸得住大眾，才能動員得起大眾，才能表裏如一地和大眾相結合起來。這所謂解放的精神，不但在其歷史的要求應是解放的（民族的解放便是其中的一種），而且其精神生活的方式也應該是解放的，就是說，人民大眾的精神生活也應該不是盲從的，奴隸的，而應該是獨立的，自主的；惟其是如此，他們才能成爲自覺的，他們才能在一定目標下，可以爲之生，也可以爲之死；他們可以在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救出民族於滅亡，他們可以在死生呼吸的頃刻，救出了自己。

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出：如果當時那民族的政治，是在幫助民族精神的向上發展，是在鼓勵解放的、進步的思想，是在喚起人民的自我覺醒，並與人民共甘苦，則當時那民族的政治必是真正地合乎當時民族向上的利益，必爲人民所擁護和歌頌；反之，如果當時那民族的政治，是在支持黑暗的及落後的精神生活，是壓制解放的、進步的思想，是在鼓勵人民的迷信和盲從，並對於人民自視爲有天賦的特權，則當時那民族的政治必是不能真正地合乎當時民族向上的利益，終必爲人民所背棄，而這個政治無論如何逆流，也終必不能敵住進步的潮流，終必在進步的潮流中湮沒自己，就是說，新的終將代替舊的，有生氣的終將代替僵死的。新陳代謝——這是真正不可抵抗的力量。

二 近代中國民族的覺醒

中國人的精神文化，在歷史上有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政治，給了這精神文化的發展以一個極沉重的打擊。關於秦始皇這個罪惡，最爲二千餘年來中國人所深惡痛絕，任何偏袒的歷史家，都無從抹去他這大罪惡，也就是說，「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近年來會有人想修改這歷史，想把定案重新翻案，但這只是一件徒勞無功的工作）。二千餘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所以表現是停滯狀態的，那抑止人民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的專制主義，是有其一定的作用的。專制主義加給人民以精神的桎梏，就弄到民氣時常不能廣大振作起來，時常給外來敵人以可乘之機。中國百年來的成爲多苦多難的民族，正是受了這點深重的影響的。

百年來中國是多苦多難的民族，可是這民族又是具有無限希望的民族。中國人民在近代開始受苦受難的時候，那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民，已寄託其熱烈的、偉大的希望。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已指出了：「滿清『這個帝國，已極其腐化，它未必能夠在什麼地方約束本國民衆或抵抗外國的侵入』。他們已指出了：『過了不多年以後，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臨死的鬥

爭，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他們已指出了：「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和印度，現時是亞洲的有決定意義的國家。」在不少地方，他們已明確預告了中國民族的覺醒對於全世界歷史之偉大的意義，他們指出了：「……有一件事終究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已處於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

中國民族的覺醒，在多少次的對外抵抗與國內政治上的革命中表現出來，也在多少文化上的革命運動中表現出來。歷來的文化啓蒙運動，都是中國人精神上的革命運動，自譚嗣同向中國人民號召「沖決網羅」以來，這種文化啓蒙運動已開始成爲自覺的。歷來這種文化啓蒙運動所要求的，就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解放和改造，要求創造新的宇宙觀，要求中國文化的再生，要求中國的自我覺醒，要求迎頭趕上世界文明的水準。中國的衰弱，使得一切先驅的中國人都感到要獲得民族的解放，就需要精神生活的解放。許多先驅的中國人，數十年來在不合理的政治下，被剝奪了爲祖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的權利，被剝奪了獨立思想和發表著作的自由；譚嗣同是死在慈禧太后的刀下，李大釗是死在北洋軍閥的絞架下。然而，他們究竟不自費自己的努力，他們艱苦種下的種子畢竟是發了芽，而又結成了果實。失敗的終歸不是先驅者，而是對他們實行陷害的人。中國是在踏着自己先驅者所開創的路，是在踏着覺醒的路，誠然，這路是曲折的，然而這

路畢竟是生路，並且也沒有誰能阻止得住中國人走這條生路。

中國歷來的一切覺醒運動，給了一個最不可爭論的教訓，就是：這種覺醒運動之所以有力，一定是因為和人民大眾相結合；另一方面，這種覺醒之所以受挫或陷於一時的失敗，又一定是因為和人民大眾相結合的不足。

三 沒有民族的自由，毋寧死！

沒有民族的自由，毋寧死！中國人在「保衛祖國」的旗幟下，進行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了。中國民族現在是處在偉大抗戰——民族大革命的新時代，是處在死裏求生——偉大黎明的新時代。要取得新時代的最後勝利，戰鬥的中國人更普遍地需要明確的戰鬥的新宇宙觀，更普遍地需要新鮮的、活潑的、昂壯的、大氣魄的、公忠體國的、解放的、獨立的、自由的精神生活。

近代中國民族的受苦受難，受屈受辱，以「九一八」以來最為慘痛，蘆溝橋事件最明白地告訴了一切中國人：亡國滅種的危險已迫在眉睫。然而，正是這兇悍的日寇却鍛鍊出一個強大的中國。日寇要把中國化為粉碎，却把中國變成士敏土了。日寇想把睡獅一下子絞殺，却真正把睡獅喚醒起來了。在歷史上，強暴者從來正是鍛鍊出自己的掘墓者以便埋葬自己。歷史總是違反強暴者的意志而進行

的，否則，歷史便不可思議。

在日寇面前，中國人回憶了自己祖先的光榮，中國人回憶了自己祖先創造的能力，中國人回憶了自己祖先戰鬥的英勇，中國人回憶了自己祖先所有過的光復舊物的史蹟；同時，中國人也進一步地了解了舊的中國必須改造成新的中國，中國在政治生活上，在物質生活上，在文化生活上，一切古老的渣滓是不適合於現代民族的生存，也不適合於目前的抗戰；進一步地了解了一切不好的舊東西便不應該讓其繼續存在下去，進一步地了解了中國應有自己的新前途。這樣，中國人在各方面更迫切地需要自己的新生活，而精神生活也是更迫切地需要新的。一切腐敗的、頹廢的、黑暗的、迷信的、盲從的、獨斷的、武斷的、壟斷的、自私自利的精神生活，不適合於這民族爭取生存的大血戰，是完全暴露出來了。因此，正如蔣介石先生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所說到的：「我們要從今天起，澈底檢討自己精神上的缺點，要從今天起，更要從精神上澈底的除舊佈新，革面洗心，作一對時期的動員，要使從前的缺點，譬如昨日死，今後的精神，譬如今日生，以煥然一新的精神，作堅苦森嚴的戰爭。」

國民精神總動員，應是國民精神之解放和改造的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應當是國民創造自己戰鬥的新人生觀運動。

第二章 中國民族的本體

一 中國民族的本體——中國人民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民爲貴。」——孟子

——「古文尙書」五子之歌

中國人民的新人生觀，關於民族的了解，最主要的問題，是關於民族本體的問題。要明確認識這本體，我們才能了解：中國民族是怎樣地存在？中國民族將要依靠什麼力量才能最後戰勝民族不共戴天之仇——日寇，而得屹然獨立於世界？中國民族是應該走上怎樣的自己歷史前途，才能更加生存繁榮於大地？關於這本體的問題，是中國民族過去、現在和將來歷史發展之最基本的問題，是中國民族生命延續或衰微的問題，就是說，是中國民族存亡生死的問題。

中華民族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但是，什麼是我們中國民族的本體？最確當不移地說，中國人民就是中國民族唯一的本體。這人民是指那絕大多數的人，而不是指那某些脫離大多數人的少數人。這人民基本上是指那「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中國勞動人民，這勞動人民在中國民族中佔百分之九十以上。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國民族不成其為民族；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長期為工為農，生產一切衣、食、住的生活資料，則中國民族就不能生活。

中國民族生存繁榮的歷史，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勞動人民披荊斬棘、艱難締造的歷史。中國人的歷史，中國民族的歷史，主要的是中國勞動者——生產者的歷史。他們創造了中國民族的物質生活，他們創造了中國民族的精神生活。任何中國的文化工作者，任何中國的思想家、發明家，從來都是中國勞動人民所養育出來的，沒有他們的養育，任何文化工作者，任何思想家、發明家，就要斷絕自己的生活，就無從去進行自己的工作。同時，任何中國的文化工作者，任何中國的思想家、發明家，如果不是依靠勞動人民之改造自然和創造歷史的實際經驗，就不能有什麼創造，就不能有什麼發明。

歷來任何反抗黑暗和暴虐的工作和運動，而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的，是中國勞動人民做骨幹。

歷來任何抵抗外患和光復舊物的工作和運動，而捍衛民族生存至今的，是中國勞動人民做骨幹。

所以說，中國勞動人民是中國民族的本體；中國勞動人民是中國民族歷史發展基本的動力。過去的人們把中國的歷史看成是少數人的歷史，看成是皇帝或個

人英雄的歷史，同時也把中國民族看成是少數人的私有，把皇帝或個人英雄看成等於民族，這是顛倒的觀點，自私的觀點，新人生觀則需要把這一顛倒的觀點，再顛倒過來。

一個革命偉人說得很對：「領導者們有的來了，有的去了，但民衆還是依然沒有改變。只有民衆是永遠不死的。其他一切都是暫時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們，個人英雄們，他們有的來了，有的去了，但中國人民却永遠不死。孟子這樣說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這正是就個人的家乘而說的。個人的家乘，不論是誰，的確在歷史上是很有限的，但是中國人民的歷史却是無窮的，這中國人民無窮的歷史，就是中國的歷史，而這民族之所以存在，就因為它是人民的。

二 中國是中國人的國家

「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

——「詩經」，玄鳥篇

中國是中國人的國家。中國民族的本體是中國人民——特別是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中國這國家的主人翁，也不是別的，而是中國人民——特別是絕大多數

的勞動人民。

中國人關於國家的字義，本來含有幾種意義（幾種含義，時常是被一些人混淆不清）：其一，是把它和民族當成同義；其二，是指中國民族所衣、食、住的領土（即國度）；其三，是指一定社會中所存在的政治權力。在多少年來民族被掠奪的苦難中，這「國家」是很明白地特別意味着中國民族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不過，不論從那方面看來，有一個說法是恰當的：中國是中國人的國家，而且更應是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中國勞動人民的國家。

中國——這是我們中國人歷史上生存的地方。我們民族不是生存在空中，而是生存在地面上，這地面就是中國。我們中國國內各民族自遠祖以來，就是居在這裏，勞動在這裏，食在這裏，衣在這裏，田宅廬墓在這裏，創造文化在這裏。這裏的山河、原野、宮殿和森林都是我們中國人經過勞動藉以取得生活資料的自然源泉。中國人在這優美、雄壯而偉大的自然中，沐雨栢風，手足胼胝，以啓山林，驅蛇龍，治洪水，禦瘴癘，改變了自然，創造了自然，同時也創造了自己的生存。中國——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侵犯中國，就是侵犯中國人的生存。

民族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形式。在一定歷史意義上看來，國家（這裏意味着民族生存的領土）是民族存在的一種歷史形式。沒有這種存在的形式，就不能真正成爲一個民族。猶太人所以不能形成爲一個真正的民族，就是因爲沒有這種存

在的具體形式，沒有一定的領土——國家。把民族和一定的領土隔離開來，這就是把民族變成看不見的力量。同時，也正如歷史所告訴我們的，一切侵略者要毀滅別的民族，要把別的民族淪為自己的奴隸，就首先要侵奪其領土（國家），而任何民族要獲得生存，就首先要把異族侵略者的鐵蹄從自己的國家——領土中驅逐出去；現在日寇對於中國進行野蠻的侵略戰爭和中國民族進行的自衛戰，就是這一樣的歷史。

所以說，保衛中國的國家——領土與主權，是為着保衛民族的生存。所以說，保衛中國的國家——領土與主權，是每個中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一切中國勞動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中國勞動人民給予着民族生命延續和繁榮的生活品，中國勞動人民給予着保衛祖國的人力和物力。沒有中國勞動人民，國家——領土與主權，是不可設想的。保衛國家，就是所以使中國得成為中國人自由勞動生產的樂土。保衛國家，就是應為的使絕對大多數的中國人得在中國國家中實行其主人翁的權利與義務。保衛國家，就是應為的使中國這國家真正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真正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國家。

如把國家看成只是少數人的國家，把少數人當成國家的主人翁，把少數人的利益當成全國家的利益，這也有如那把民族看成只是少數人的民族，把少數人當

成民族的主人翁，把少數人的利益，當成全民族的利益，同樣地都是顛倒的觀點，自私的觀點。在新人生觀中，是不應存在着這種觀點了。

三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與人民至上的統一

保衛民族的生存，對侵略者——日寇抵抗到底，以民族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爲利益，以民族絕大多數人的幸福爲幸福，爭取民族的最後解放，這才是民族至上。

保衛祖國，把侵略者——日寇掃蕩驅逐於國門之外，依靠絕大多數人的力量，以挽救祖國的危亡，把國家看成是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絕大多數人的國家，這才是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與中國人民至上的統一。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與民族絕大多數人（勞動人民）至上的統一。

真正愛民族愛祖國的人，必是與日寇不妥協的人，必是願意並且在實際上號召、組織和武裝絕大多數人起來保衛自己祖國的人。

真正以民族、國家利益爲最高利益的人，真正了解民族、國家最高利益的人，必是不害怕絕大多數人的人，必是願意依靠絕大多數人的人，必是以絕大多

數人的利益當成自己利益的人。

真正願意民族國家獲得最後解放的人，真正爲最美滿、最幸福的民族、國家而奮鬥的人，必是努力給絕大多數人以自由幸福的人，必是努力解除民生疾苦的人。

在公益與私益的矛盾前面，要解決這矛盾，就應犧牲私益。

在大我與小我的矛盾前面，要解決這矛盾，就應犧牲小我。

但犧牲私益以爲着公益，同時也正是爲着私益；真正私益正是在公益中才能真正得到保存的。離開了公益，私益是狹隘的、不完全的、最暫時的。

犧牲小我以爲着大我，同時也正是爲着小我；只有在大我中，小我才有真正自由活動和自由發展的餘地。離開了大我，小我不能存在，而小我的自由活動和自由發展同樣地是狹隘的、不完全的、最暫時的。

這樣，公益以犧牲私益而保存，而發展；私益又以公益的保存和發展而保存和發展。這樣，大我以犧牲小我而保存，而發展；小我又以大我的保存和發展而保存和發展。

一個人，或不論那一部份人，是否最完全、最無遺憾、最徹底的公忠體國，是否最完全、最無遺憾、最徹底的以民族、國家爲至上，是否最完全、最無遺憾、最徹底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就是必要看其能否

犧牲私益，犧牲小我，和民族絕對大多數人在一起；而一個人，或不論那一部份人的能否犧牲私益，能否犧牲小我，能否和民族絕對大多數人在一起，不是從其口頭上表現出來，而是從其實際上表現出來。

一方面希望抗戰勝利，希望人民大衆起來報國；另一方面，又不願意人民起來，並且在實際上對於人民還加着不少的鐐銬，這是自私自利的作祟，這是在實際上不遵守「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原則，這是沒有深刻了解「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中國古訓，這是在公益與私益、大我與小我的矛盾前面，不想去解決這矛盾，反而去加深這矛盾。在這裏一走上極端，便是把私益和小我代替了一切，把民族國家棄置如敝屣，成爲日寇的奴婢，如鄭孝胥、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之流。

不依靠中國絕大多數人，中國民族解放的事業，將一定不能成功。不犧牲自私自利，結果就會弄到一無所有。這是中國革命的教訓，這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規律。

有一個時候，有些人因爲被私欲私利所蒙蔽，因爲害怕民族絕大多數人的從夢中覺醒起來，從而犧牲民族國家的大利益以遷就私己的暫時小利益，犧牲革命的利益，以遷就革命敵人的利益，結果日寇打進來了，日寇佔領了我們大片的江山，工廠被毀滅了，土地被盜取了。爲私欲私利所蒙蔽的人們，反轉而失掉了自

己的一切了。

有一些人在一些正在被日寇進攻的地方，不願意把那裏的人民組織起來，不願意把那裏所存留的武器把人民武裝起來，結果日寇打進來，那裏所存留的武器都悉數被日寇取用來打中國人了，那裏來不及起來反抗的人民，許多被日寇俘虜，被日寇強迫開槍來打中國自己了。同時，那爲私欲私利所蒙蔽的人們，在那裏所有的東西，也正是什麼都失掉了。

所以說，先公而後私，以公爲私，這就是公私各得其所，這就是民族、國家生存之道。反之，先私而後公，以私爲公，這就是公私兩亡，這就會陷民族、國家於萬劫不復。

第三章 中國民族的歷史運動

一 中國民族歷史的光榮、停滯、不幸與復興

世界人類文明的發展，一般說來，首先是由東及西的。東方是古代——以至中世紀時代——世界文明的搖籃，中國就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搖籃地。

中國人曾經是光榮的。古代中國人經過自己的勞動，把東亞的大陸原野變成肥沃田疇；古代中國人發明了蠶桑；古代中國人發明了奇技極巧的工業；古代中國人創造了高明精確之一的天文學；古代中國人創造了至今不朽的可貴哲學思想、戰略思想；古代中國人提出了至今為全球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兼愛、大同思想。中國人曾經是光榮的。許多人把近世世界文明史的發展，歸功於印刷、羅盤和火藥的發明，這些發明，正是中世紀時代由中國輸進了歐洲的。

中國人曾經是光榮的。中國人善於在極困難的條件和環境下，艱苦勞作，臥薪嘗膽，死裏求生。中國人善於在民族被侵凌被奴役的時候，堅決抵抗，謀復舊物，即使遇到失敗，然而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終於能在一定時

間，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國人曾經是光榮的。中國人會富有求知的精神，富有為真理殉難的精神。戰國時代墨子及其門徒的蹈湯赴火、効忠真理、以殉人之急的精神，正是表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精神的偉大。在中古時代，中國佛教徒的求學印度，大都經過恐怖險阻的千山萬水，九死一生；但是，還是前仆後繼，志不少衰，而這種留學運動前後竟一直垂到五百年的長時間。

是的，中國人曾經是光榮的。中國民族是世界歷史上最古最大的民族。是歷史最悠久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上存在着的諸民族，也有和中國民族同樣古的，但是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民族更大；而且，和中國民族同樣古的民族，除中國外，已大部份被人所滅亡。這不僅是因為中國人『得天獨厚』，而特別因為中國人是真正地能久經了戰鬥。

（本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國度），在中國國家內除漢民族外，還有其他少數民族的存在，如蒙古族、回民族、藏民族、苗族、羅羅、獯獯民族……等。所謂『中國民族』，可說是中國各民族一個習慣上的總稱。漢民族是中國各民族中最大的民族，也是文明最早的民族。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中，最古的漢民族是佔最大多數，其戰鬥最久，因此，其對文明的貢獻也最大。但是，國內其他一些民族則或先或後，對於文明同樣地是做了不

少的貢獻。)

我們已知道：和自然界戰鬥，和腐敗黑暗的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其主力不是別的，而是中國的勞動人民。但是，歷史却有顛倒的另一面。自從中國有社會分裂以來，凡是苦難的負擔，却又大都是歸給中國的勞動人民。中國勞動人民創造了一切幸福，但自己却沒有了一切幸福。中國勞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自己在過去却仍是落到最受苦難的結果。這就是所謂「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這種顛倒本來是各國一切階級社會的特點，然而，二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有其特別深刻不幸的一頁的，這特別深刻不幸的一頁，使中國民族受過了很多的慘痛，使中國社會發展陷於長期的停滯狀態，而結果使中國數百年來在世界上成爲落後的民族，使世界新起的資本主義列強乘機而進，淪爲半殖民地，並被日寇乘機蠶食鯨吞。

在戰國時候，中國勞動人民被剝削的苛重，已使當時許多優秀的哲人爲之心驚胆戰，奔走呼號。即使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爲「天下之通義」的孟子，也已指斥了當時社會情形之極端的顛倒。他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二千年來，封建專制社會制度對於勞動人民的剝削，並且更加慘重，而即使極頑固擁護封建制度的人們，對於社會潰滅的危機，也時常迫得不能不發出關於挽救

的呼聲；因爲在他們看來，爲着剝奪別人的生活，同時還要讓被剝奪者生活。殘酷的、過度的封建剝削，也就是剝奪了基本勞動人民改善和擴大再生產的可能，剝奪了勞動人民關於生產的興趣，他們無暇「舉首奮臂，以營求一飽之外」，（蘇軾）在平常日子，大抵只能在無可逃生的絕望中，不斷地反覆進行單純再生產；這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在龜步的情形中走路，很難於較短的時間，有突飛猛進的發展的。但是，生產力乃是社會生產最活動和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產發展的決定的因素。民族文明的能否突飛猛進，是以生產力的發展如何爲決定的。民族的進步或落後，是以生產力的發展如何和人民幸福程度的發展如何爲準繩的。由社會特別深刻的極端顛倒，所造成的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停滯狀態，使中國人由先進的變成落後的了。在這種生產方法底下，在這種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停滯狀態中，人民的智慧和文化的發展，是被窒息的，人民被蒙蔽了眼睛。

二千餘年來，中國歷史表現了一個特殊的規律，就是：關於那種「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剝奪過程，一出數量發展到質量的時候，便一方面形成了全社會的農業大饑荒，另一方面則激起了農民的大戰爭。這情形差不多是每二百年左右（或多或少）爲一週期，便出現一回。過去歷史上農民在戰爭中，因爲缺乏城市有組織的革命階級的指導，一般地陷於失敗了。在農民戰爭失敗的歷史事實中，我們曾看見過一些吮吮農民脂膏以自肥的人，爲鎮壓農民的興起，

竟不惜借助外力，引寇入犯；或從而任令外敵坐大，養寇爲子孫患，或竟不替而率直拱獻自己的國家，使同胞供人牛馬，並且也把自己供人牛馬；這就是說：爲着把別人當自己的奴隸，甚至於把自己當別人的奴隸。

然而，中國勞動人民，如我們所知道的，如上面我們已提到的，究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每次農民戰爭的結果，時常迫得新興的朝代不能不對農民給些讓步，使得農民得以稍爲休養生息，因而把生產力的發展又或多或少地推進了一步。又如我們所知道的，如上面我們已提到的，某些統治者引寇入犯或竟把國家斷送了，而結果農民又是成了「我必復之」的基本力量。在歷史上，爲着私利，竟把民族、國家爲孤注一擲，而使勞動人民更深受亡國的苦難的，總是剝奪勞動人民的人；而把民族國家倒轉收復過來的，却又是在亡國中最受苦難的、自我犧牲的、被剝奪的勞動人民的力量。歷史是這樣顛倒地進行的，而這却是我們過去歷史的真面目。然而也正是中國勞動人民在歷史上有這樣的潛力，給中國民族永遠產生了無限的希望；正是中國勞動人民在歷史上有這樣的潛力和戰鬥歷史，所以，我們充滿了自信心，認爲中國最後必可以轉弱爲強，必可以從落後的民族重新轉成爲先進的民族。近代中國無產者這個最富於政治覺悟和組織能力的階級之出現，站在全民族的前頭，站在中國一切勞動人民的前頭，就更無限地指出了中國這種光明的前途，而全部近代中國史正給我們以這樣的證明。中國人是不可免

地將更光榮地站立起來。中國民族是在復興，中國人將比過去任何時代將更加發現自己，將更加強盛，將更無比地貢獻文明給全世界。

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在開始，東方是先進，文明的發展是由東到西；隨後，西方是先進，文明的發展是由西到東。然而，東方是又起來了，東方沐浴了歐風美雨，又繼續發揮了古代的、中古的以及從西方來的文明。東方又成爲先進的了。東方將與全世界並駕齊驅，建築簇新的世界。這簇新世界的建築，沒有東方是不能達到最後的成功。這東方，中國是決定的力量。

大家知道：列寧關於「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的名文，主要是對中國的復興而說的。列寧在「維新的中國」文中指出：「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可說已從睡夢進到光明，進到運動，進到鬥爭了。」中國的興起佔全人類爭取新文明的重要篇幅。列寧在逝世以前，寫道：

「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要靠俄羅斯、印度、中國等國家佔人民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民的大多數，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轉入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因此，在這一點講起來，不容絲毫懷疑到：世界鬥爭的最後結局將是怎樣的。在這一點上講起來，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完全地和無條件地有了保證。」

二 兩極相逢與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基本動力

馬克思在其『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的論文中，提到兩極相逢率。『兩極相逢』這句著名的格言，在他看來，是全部實際生活中偉大和重要的真理。『馬克思從東方與西方——中國與歐洲的聯結上來說明這同樣的真理。近代中國的新生，是受了歐洲文明東進的影響的。馬克思以諷諧的筆調，諷刺過英國輸進鴉片到中國來的這一件事：『鴉片漸漸取得對中國人的統治權，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們，也就漸漸失去自己的統治權……我們可以認為歷史之所以須要麻醉該國人民，爲的是要把他們從歷來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馬克思在其他地方說到西方商品對於東方舊經濟基礎的破壞的時候，他還這樣寫過：『……我們看見這些成千成萬的、勤懇的、宗法的、安分守己的社會集團被破壞和瓦解，心裏自然非常感動；看見他們沉淪苦海，其中個別份子失去其古代的文明形式，又失去其歷來的生活來源，心裏多麼悲痛，——然而，我們到底還是不應當忘記，這些關閉自守的村社，無論其怎樣純良，它們始終是東方專制政體穩固基礎，它們使人的理智拘泥於最狹隘的範圍內，把理智變成迷信的訓服工具，使它服從傳統慣例，使它不發生什麼影響，使它不能努力於歷史上的活動。』馬克思的意思就是說，

西方人的向東方侵略，一方面引起了沉重的不幸，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是給東方引起了經濟上的一個大革命，並喚起了廣大勞動人民從迷夢中覺醒起來，而努力於歷史上的活動，努力於反抗侵略者的魚肉。同時，東方這種覺醒，又必將反轉而對於西方文明史的前進，給予很大的推動，這也正如馬克思根據當時的情況所寫過的：『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制度底那裝滿着炸彈的地雷上，並引起早已成熱了的總危機底爆發，這種危機，當它傳播到英國國境以外去的時候，就會直接在歐洲大陸上引起政治革命。』

兩極相逢，同時又各在其對方造成相反的結果。這是不可抵抗的歷史辯證法。

侵略者在中國鍛鍊出反侵略的力量，主要的是中國勞動人民的力量。在鴉片戰爭中，中國士兵抵抗的英勇，廣東人民平英團的蜂起，這已初步暴露了中國人民潛力的鋒芒。太平天國如火如荼的運動，這是鴉片和鴉片戰爭所直接引起的產物，而組織這運動的基本動力，便是當時南方漫山遍野的中國勞動人民——農民與手工業者。義和團的自發民族反抗運動，便是當時北方的勞動人民用落後的方式所進行的起義，雖則這起義者會被腐敗的清廷所利用，然而其視死如歸的精神，終是應在中國覺醒史上大書特書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及其前身之一——興中會的組織和活動，是靠着會黨的力量，而會黨就是中國勞動人民本來之原始的組

織，按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原爲民族老革命黨」。孫中山先生關於當時組黨的情形，說：「……士大夫醉心功利名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富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故予先從聯絡會黨入手……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衆，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在這時候，中國勞動人民的組成部份，已不僅是農民和手工業者，而且已有在近代工業中做工的無產者了，這無產者也已成爲自發的革命力量，也已成爲同盟會中重要的組成部份了（雖然在政治上還是自發的部份）。真的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會黨的力量，則興中會及同盟會就會缺乏力量的依賴，就不能成就辛亥革命。根據歷史的事實來說，這話是毫不過分的。列寧在辛亥革命論到孫中山先生思想之民粹主義色彩（按即指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時候，這樣寫道：「如果沒有民衆的偉大的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得共和國。這種高漲，就需要和產生一種對勞苦羣衆的狀況所表示的極懇切的同情，與對他們的壓迫者及剝削者所表示的極熱烈的仇恨。」列寧是完全了解了中國革命的真正動力的。

辛亥革命前中國勞動人民——工人和農民固然在政治上還是沒有達到近代自覺的地位。可是，這種自覺，是在與時俱進，是在與自己力量的生長俱進。辛亥革命向失敗，正指望了：將來革命的勝利需要新的力量起來，這新的力量，特別

是指望那從近代工業中鍛鍊起來的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工業中和民族工業中做工的無產階級，這階級雖然數量還不多，在全人口的比重上還不算大，然而這個階級是最進步的經濟形式——大生產相聯繫的勞動階級，它一身除了勞動力，沒有自己的私產。因為它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最後的階級，它在一切解放事業中，除了擺脫各種鎖鍊以外，它不會損失絲毫，所以，他是最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代表民族絕對大多數人利益的階級，是能和農民及其他革命的人們在一起堅決為革命事業而奮鬥的階級，是最能為一切革命事業奮鬥到底的階級，是真正能成為全民族求解放的首領。因為大生產的協作方式，鍛鍊出這階級的集中，鍛鍊出他們的組織能力，所以，它是唯一的能夠團結全國民眾並能幫助全民族組織起來以與一切民族敵人戰鬥，並能夠從事民族一切最偉大的建設事業，而可獲得真正勝利的階級。因為最先進的大生產的經濟形式，是唯一的可以走進人類大同新社會（共產主義新社會）的道路，因為大生產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和科學的密切關聯，這樣，大生產的經濟形式正是鍛鍊出無產階級成為具有最偉大歷史前途的力量，同時，也正因為它是具有最偉大的歷史前途，所以，它又具有最偉大的歷史遠見，能在各種曲折的道路上，引導民族和世界的歷史前進。綜合來看，這個階級在歷史運動中的力量，比較它在人口總量中所佔的成份，要大得沒有限制；中國民族、人民解放事業，因為這新人類自覺的出現，恰是劃出了一新時代。一

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事業，一九二七年後工農代表會議的革命運動，國內的和平統一，抗戰的促成，華北、江南一切最前線收復失地殲敵敵人的偉績，以至五四以來一切文化運動的展開，民族自我覺醒的深入和普遍，這都是和這個階級的血肉不可分開的，是這個階級站在歷史前頭和廣大農民、知識份子以及在一定時間和各種站在革命陣線上的市民階級聯合奮鬥的結果。

孫中山先生晚年的偉大，就是在他明白地肯定了這工農的力量，是民族解放唯一的基礎。中山先生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裏所說的民衆，主要指的就是工農大眾。孫中山先生主持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發出的宣言，說：『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其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之真正的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這裏所說的『平民階級』，也就是工農大眾；也就是如那宣言所說：『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歷史的一切勝利和失敗，完全證明了這一個不可顛撲的真理。任何人願意中國革命成功，願意中國民族獨立和強盛，願意中國人民自由和幸福，就必要在這真理面前低頭，而對於這真理低頭，不是他的恥辱，而正是他的光榮。對於這真理低頭，就個人來說，這決不是個人事業的

降低或抹煞，而是個人事業的提高和朽。民衆的事業即是個人的事業；而如果是任何個人的事業和民衆的事業背道而馳，就決不是民族的事業，同時，也決是不值錢的事業。民衆事業與個人事業的統一，民衆事業與民族事業的統一。

毛澤東先生在「論新階段」上，對於我們抗戰事業，這樣說過：「依靠民衆，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衆，則將一事無成。」這是抗戰經驗一個簡切的概括，也是一切歷史經驗一個簡切的概括。這裏所指的民衆，主要的也當然是工農大衆，是中國近代的勞動人民。依靠和發揚工農大衆的力量，則可以填海，可以移山，離開或摧毀工農大衆的力量，則決不能獲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則決不能復興我們的民族。

中國民族必將生存下去，而中國民族的生存，必須是民衆——廣大勞動人民的生存；中國歷史必將前進，中國民族不共戴天之仇的日寇必將在中國近代歷史車輪的前進運動中軋碎，而推動這中國近代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乃是工農大衆，乃是中國近代的勞動人民。毛澤東先生在「論新階段」中指出：「十五個月抗戰又證明了民衆援助抗戰力量之偉大；同時也證明了民衆力量之僅在開始發動，因而使抗戰得不到民衆的廣大援助而遭受了許多挫折。以此得到教訓，國人必須進一步地認識抗戰依靠民衆這個基本問題。」抗戰的決心與勝利如何，在關於這個中國近代歷史基本動力的態度上，是問題的一種試金石。

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不是建築在空談上，而是建築在真實的力量上。凡是主張並努力去依靠民族內部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有最高貴、最真實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和對於民衆力量的相信與尊重，是統一的。沒有真誠相信與尊重民衆的力量、利益和意志的，就很不容易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因為他沒有看到民族可以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真實力量，他沒有看到保衛祖國和最後勝利的真實力量。

爲什麼我們是無畏的呢？因爲我們有使敵人可畏的力量。爲什麼我們是必勝的呢？因爲我們有使敵人不可勝的力量。這力量是什麼呢？這力量就是近代中國勞動人民。孫子說：「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說：「故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如何能「先立於不敗之地」呢？這要我們自己能最大限度地依靠民衆的力量。如何能「先立於不敗之地」呢？這要我們自己有民衆力量堅強的陣地。孫子的名言，只得在這民衆的力量中，可以得到最正確的解釋，而我們必要能和民衆的力量深相結合，才能真正援用孫子的名言。

近代中國民衆——工農大衆的力量，是中國民族復興的基礎，是中國革命基本的動力。這個動力具有旋乾轉坤的大力，這個動力能使中國民族起死回生，這個動力能夠把日寇變成粉碎，這個動力能夠掃蕩中國民族中一切舊的障礙中國民族繁榮光大的渣滓和垃圾，這個動力必將使中華民族在東亞大陸上叱咤風雲，在

一定歷史時期中，創造起中華民族完全嶄新的生命，而根據無產者和全體人民結合的智慧與能力，必將使中國民族的進步與繁榮，在極短的時期中，超越過我們祖先數十世紀的努力，超越過世界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數世紀所達到的水平，而向全世界的人類自豪。

三 抗戰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道路

現在是日寇豕突狼奔在我們的國土，「凡是日寇的炮火所到，凡是日寇的鐵蹄所到，不僅我們那裏的男女同胞，或萬、或千、或百、或無數的生命，橫遭殘酷無倫的毀滅、屠殺和姦淫；不僅我們那裏的財富，我們那裏數十年由我們祖宗和我們這一帶同胞所血汗經營而來的產業，橫遭殘酷無倫的毀滅、洗劫和搶掠；而且我們那裏的文化，不管舊的或新的，都橫遭殘酷無倫的毀滅，都爲之蕩然無存。」在日寇統治下，中國民族將被毀滅，而不用武力驅逐日寇，就不認結束日寇在中國統治。所以，爲着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今天抗日是第一。抗日戰爭將決定中國民族的歷史。今天是一切服從抗戰，一切爲着抗戰，一切是爲着求抗戰的勝利和最後勝利。

今日中國民族生存的鬥爭，是武力的鬥爭，是軍事的鬥爭。今日中國民族的

生存與否，要依靠在疆場上的武力角逐，以取得解決。『在此解決中國民族存亡之軍事期中，國家民族之最大利益爲軍事利益』。『爲達成軍事之利益，國家民族得要求國民爲一切之犧牲，而爲國民自亦必自動踴躍而貢獻一切之所有』。〔「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要達成這最高度的軍事利益，就必須有廣大無限的國民——人民之武力。現代戰爭號稱全民戰爭，而弱小民族要取得勝利，正需要名符其實的全民戰爭。什麼是我們名符其實的全民戰爭？就是：戰爭是爲着全民，而戰爭又是全民的。所謂戰爭是全民的，就是說，戰爭是全面的，是全民的總武裝，是全民的武力；就是說，要實行全民總動員，要給全民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便利和自由；就是說，要使國民成爲武裝的國民，要使武裝成爲國民的武裝。我們爲着民族、國家的生存，要求國民實行爲抗日軍事利益而爲一切之犧牲，首先要給予國民犧牲的機會，讓國民總動員總武裝起來，讓國民得自動地在疆場上出力，爲抗日軍事利益而做最光榮的犧牲。我們爲民族、國家的生存，要求國民實行爲抗日軍事利益而爲一切之犧牲，首先要要求一切人『犧牲一切私見、私心、私利、私益』，以民族的利益爲利益，以人民的利益爲利益，反對對人民磨擦，反對對人民加緊進行階級鬥爭，放膽和人民大眾相接近，在政治上在經濟上處處以人民利益爲前提，實行毀家紓難，有錢出錢，不顧及個人和少數人的地位，以求實現最廣大的軍事利益。

「軍事之唯一目的，在求得勝利，則國民務須確立必勝之信念，達成最後勝利之目的，且竭其全部之知能與全部之時間精力，以求取軍事之勝利，在此時期，應無所謂個人得失，個人利害，與個人之屈伸與榮辱，唯求得軍事之勝利乃為吾國民人人共享之光榮，唯不能獲得勝利為人人最大之恥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當以此為標準。」（「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如何能確立必勝的信念？要信賴民衆的力量。如何能達成最後勝利之目的？要依靠全民的武力。如何能使人人知道光榮與恥辱，知道功罪與是非？要責罰分明，勝利者必賞，破壞勝利者必罰；要褒貶分明，進行軍民合作以取得勝利者必褒，離開民衆以取得失敗者必貶。勝利是不能憑空而取得的；勝利必定要依賴於一定的基礎，依賴於人民。孫中山先生逝世前的北上宣言寫道：「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孫中山先生這裏所說的「成功」，就是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而我們要求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要按照孫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這最後勝利的正確道路。

所以說，組織全民的武力，以造成最偉大的抗戰軍事力量，這就是「軍事第一」。

所以說，依靠全民的武力，以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這就是「勝利第一」。

四 抗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道路

祖國危急了。爲着求得抗戰軍事的優勢，爲着求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全國國民的意志必須集中起來，全國國民的力量必須集中起來。

「單則易折，衆則難摧」。這是不易的真理。中國同胞過去因受專制制度和軍閥制度的高壓，被稱爲「一盤散沙」。本來日寇好比一條蛇，而中國人民好比一隻大象，現在蛇居然要吞象了，爲什麼居然敢這樣地放肆？就是因爲日寇欺侮中國人像「一盤散沙」。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中國人民廣大的力量和意志正在走向集中的道路，可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煽惑，中國革命的陣線分裂了，一切日寇的好細和平日魚肉人民的人物復彈冠相慶，起而扯散人民的團結，扯散人民的組織了。無數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工農爲之身首異處，人民廣大的意志和力量走向集中的過程，是慘受挫折了。日本法西斯軍閥於是乘機大舉入寇，企圖於不旋踵的時間，把全體中國人變成他的奴隸。然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寇對於中國的鞭撻，却只是爲的把中國人的仇恨集中起來，只是爲的把中國人的分散力量集中起來，以便打死這最兇惡的

日寇強盜，以便創造起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舊制度的贅瘤，外來的阻礙和挑撥，人口的複雜和衆多，這說明了我們民族意志集中與力量集中的不易；然而，日寇的劫掠，却已使得我們在較短的時間，達到了我們過去長期所努力而未達到的規模。這集中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集中的規模是經過那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獲得的。有這樣集中的規模，因而實現了這偉大的抗戰，因而粉碎了日寇關於滅亡中國的速戰速決的迷夢，因而使得全國同胞、全世界文明人類都相信了：中國是不可滅亡的。

沒有意志與力量的集中，不能在疆場上進行決勝的角逐，而這意志與力量的集中問題，同時也就是關於戰爭的政治問題。孫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孫子這裏所謂「道」的問題，就是戰爭的政治問題，就是關於戰爭的意志與力量集中的問題。進行戰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於令人民同意於國家的戰爭決策，堅持這一個戰爭，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懼怕任何困難和危險。但是怎樣能令人民真正同意於國家的決策，並真正能這樣堅持這戰爭呢？這就需要這戰爭是合乎人民生死所必爭的利益，而且必要人民能心悅誠服地自覺願爲這戰爭而効死，而且必要給予人民以効死的可能和機會。這也就是說：這不但需要「民與上同意」，而且也要「上與民同意」，而且

一定要「上與民同意」，才能完滿的達到「民與上同意」。必要人民能心悅誠服地自覺願爲這戰爭而効死，才能集中意志於爭取戰爭最後勝利的大目標；必要人民得到効死的可能和機會，才能集中力量於爭取戰爭最後勝利的大目標。

這樣，爲着達到集中全國的意志，以求抗日戰爭的勝利，全國朝野上下以及各色人等（現在各黨派、各階級）之間就需要和衷共濟，傾誠相與，寬宏大量，互助互讓，共生死，共患難。

這樣，爲着達到集中全國的力量，以求抗日戰爭的勝利，全國朝野上下以及各色人等（現在的各黨派、各階級）之間，就需要合理的政治生活，就需要政府給予人民關於爲爭取戰爭勝利的組織、集會、武裝、發表意見的一切自由，並在物質上在精神上給予援助和鼓舞。

這樣，在同胞之間，在各黨派、各階級之間，就需要放棄壟斷、獨斷、武斷的態度，不應該盲目地製造磨擦，存心排斥異己，存心吞併異己。

這樣，對於人民，對於一切同胞，就需要放棄少數人的優越感，放棄少數人「唯我獨尊」的態度，不應該厭惡、懷疑、駭怕大眾。

這樣，就需要理性。這樣，就需要民主。這樣，就能達到戰爭意志和力量最大的與無限的集中。

我們民族覺醒的普遍程度，我們民族團結的普遍程度，一直到今日，還遠不

足以戰勝空前的大災難，這是事實。在將近兩年的抗戰中，那已動員到抗戰陣線上與自覺地爲抗戰而服務的人數，和四萬萬五千萬這個巨大的數目比較起來，自然還是一個極大的遺憾，而這就是抗戰以來我們還不能得到更大戰果的徵結，同時也就是給了日寇、漢奸、汪派、託派挑撥離間和煽動磨擦以及投降派準備和平妥協投降的空隙。因此，我們需要更大的意志集中，我們需要更大的力量集中，就是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我們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之唯一的道路；就是說，全國同胞必須『加緊團結，經過民主的方式，將一切分散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除了爭取最後勝利，不能有第二個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陣線，不能集中在第二個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個能夠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中共中央爲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同志書』）毛澤東先生說得好：『一切意志都要集中到最後勝利這一點上，能不能夠集中到別一點上去呢？能不能夠同日本和平妥協呢？決不能夠！一定要爭取最後勝利，一定要達到這一點！一切力量要集中到抗日陣線這一方面，能不能夠集中到別的方面去呢？決不能夠！汪精衛要把力量集中到漢奸陣線上去，集中到投降陣線上去，行不行呢？萬萬不行的！有些搗亂分子，磨擦專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後勝利一點，一切力量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處，決不能夠違反，有違

反的就反對，就要打倒，就要把他當漢奸打！」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我們持久抗戰基本的國策。依靠這個國策，我們就可以因意志和力量的集中，而達到自力更生；不依靠這個國策，我們就可以因意志和力量的分散，而會陷於滅亡。所以，對於這個國策，決「不容其分歧及懷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論」；對於這個國策起了分歧和懷疑，就會團結不固；離開這個國策，而做依靠外力的空想空論，或做和平妥協投降的企圖，結果就會自誤和自殺。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必要以國共的親密合作為基礎；全國意志和力量的集中，必要以國共的親密合作為前提。在另一個地方，我們會這樣闡釋過這一個要點：「中國民族基本的力量是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任何黨派要團結民族的力量而拋棄了工農的力量，這必然是架空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要聯合工農的力量，為什麼就必要與共產黨合作？這正如宋慶齡先生所說的：『孫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因為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而團結民族的力量——這是根據中華民族力量構成的特點，也是根據我們民族社會歷史奮鬥的調度。惟其是如此，惟其是國共兩黨是中華民族的兩大政黨，因此這兩大政黨的合作，就馬上能建立起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現在是民族抗日統一陣線來。因此，我們要全國朝野上下以及各色人等之間，如上面所說的『和衷共濟，

傾誠相與，寬宏大量，互助互讓，共生死，共患難」，首先就要國共兩黨能夠這樣互相對待，成爲全國團結的模範。

在朝野上下各色人等之間，有一點是必要洞澈覺悟的：在這樣廣土衆民的中國，如果沒有寬宏大度、與人爲善的眞誠態度，是決無濟於事的，是決不能成器的，而這種寬宏大度，與人爲善的態度，在今日就是民主的態度，民主的作風。如果在敵當前，還以打擊別人、吞併抗日的異己爲能事，還以壟斷包辦爲得意的作品；如果因爲別人顧全民族大局的讓步，竟企圖乘機把別人收拾掉；如果因爲別人的合作眞誠，竟認爲「君子可欺以其方」，利用自己的方便，時常顛倒黑白和是非；這樣，就不能有意志與力量的集中，相反，這樣，只能造成與集中之相反的結果，只能把團結的局面重新變成分裂的局面。

要求達到抗日意志與力量之最大的集中，就必要善善、惡惡。就是說：對於抗日的力量和友人，既必要有合作和互相表揚的眞正雅量，而對於日寇、漢奸、汪派、託派，又必要有不共戴天和疾惡如仇的無情。「大學」上有一段話說得很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朱註：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這段話對於我們這裏是有用的。我們現在要求抗戰的意志與力量的集中，則對於善惡也正是必要有明確的態度的，而關於抗

戰團結的態度如何，就是測度善惡的標準。一方面，見善而能舉，引之爲模範；另一方面，見不善而能退，「逆之四夷，不與同中國」；這樣，就能在廣大同胞中造成絕大的「向心力」。反之，如果一方面見善而認爲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另一方面，見不善而認爲奇貨可居（如現在有些人把出賣過人頭的共產主義叛徒葉青之流當成反共的奇貨），捧之以爲狹隘私利的工具；這樣，就是拂逆民族之性，就能造成最壞的「離心力」，而給民族以災禍，同時又是「舊必隳夫身」。

把上面說過的話再說一句：要獲得抗戰意志和力量之真正更大的集中，就必要與狹隘的關門主義絕緣，就必要民主。

把上面說過的話再說一句：要獲得抗戰意志和力量之真正更大的集中，就必要不與惡人爲伍，恥與惡人爲朋，就必要深相結合全國的革命戰士。

五 中國的改造與展望

中國一切人物或制度都正在這抗戰的偉大熔爐中受抗戰的烽火所考驗。不在乎中國民族生存的人物和制度，在抗戰的烽火中，是暴露得無遺了。一切人物或制度，壞的將被淘汰，或已經自歸淘汰；好的將被保存，或已經走上新的發揚。

爲着民族的生存，一切舊的人物或制度，都需要從新改造，而改造別人，自己也需要受改造。改造的意義，一方面是要放棄舊的渣滓，另一方面是要創造新的生命。

政治要改造，軍事要改造，經濟要改造，文化要改造。什麼是改造的標準？抗戰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個人要改造，集團要改造，社會要改造，家庭生活要改造。什麼是改造的標準？抗戰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在中國的改造中，所要實現的第一步，是什麼樣的新中國？這就是：——

第一，驅逐日寇，打到鴨綠江邊，中國民族領土主權的完全獨立與完整。

第二，實現全國的民權制度和廉潔政治，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的完全自由，人民有選舉權、罷免權、複決權、和創制權。

第三，廢除封建剝削的田制，耕者有其田，工作八小時。

這就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主義新中國，是孫中山先生按照林肯的說法，所謂「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或者更如毛澤東先生在「論新階段」上較詳細的說法：

「第一，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它是一個獨立國，它不受任何外國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即是說，改變中國原來半殖民地地

位，它獨立起來了；但同時，無論它強盛到什麼程度，決不把自己變為帝國主義，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國獨立的友邦和平往來。第二，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權主義的國家。國內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級官吏是民選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設立人民代表會議的國會與地方議會，凡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階級、男女、民族、信仰與文化程度，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國家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並在政治上、物質上保證之。第三，這個國家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它不否認私有財產制。但須使工人有工作，並改良勞動條件。農民有土地，並廢除苛捐雜稅，重租重利。學生有書讀，並保證貧苦者入學。……

這就是要把半殖民地（九一八以來已有一大片土地變為日寇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變為獨立的民主主義的國家，變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展望，而在全國一些抗日民主的模範區，已開始表現着這樣的新生。這個民主共和國，大概將是一種工、農、小資產階級和進步的資產階級之聯盟的統一民主共和國；這個民主共和國，不是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從其真實的經濟意義上說來，沒有越過資本主義的歷史範疇。民主主義的具體內容，如獲得貫徹實施，只在改變舊的封建生產關係。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之主觀的社會主義色

彩，在客觀上恰是要求資本主義之廣大的發展。

三民主義的歷史範疇，是民主主義的範疇。這種民主主義共和國，主要的是在完成一種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它的前身是封建社會（近百年來成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社會，而它自己則是民主主義社會。它從封建主義社會來，要到社會主義去，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則是爲了完成民主主義社會而鬥爭。」（毛澤東：「五四運動」）

所以可說，革命的民主主義有其過去，也有其將來。所謂有其過去，就是說，它否定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在中國的奴役；所謂有其將來，就是說，它將產生新的否定——資本主義又將被社會主義所否定。

社會主義——這是我國數千年來最優秀人們的夢想，這夢想，墨子稱爲兼愛，「禮運」稱爲大同。墨子的學說，所謂「食饑息勞」，所謂「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所謂「老而無妻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這主要的是反映了當時具有小私有者性質的勞動人民之原始的共產主義思想，在墨家的團體中，且實行過一種原始的共產主義生活。禮運「大同」，則有以下一段的描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

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這一段話，也是共產主義之原始的思想，而在數十年來，並爲我們國人所公認的民族最高理想。民族是歷史的範疇，同時，我們民族生活最後的建立，需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這是無疑問的。

什麼是真正大同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就是，在那裏，生產工具公有，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階級是不存在了，社會可能按照預定計劃來生產，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不再存在了，社會生產的福利將完全歸給社會大眾來享受，社會生產力將有一日千里、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的幸福也將是無限的，社會的道德，以及人類每個人的天才和個性可得到最自由最合理的發展，人類真正成爲自己的主人，成爲自然界的主人，成爲真正的自由人。按照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人類還只能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生活，而到共產主義的第二階段，因爲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則社會在真實生活上，就可完全立起「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旗了。到那時候，每個人的生活都真正可以稱爲「天之驕子」而無愧了。

像這樣的大同社會制度，在我們民族過去的歷史上，還只是一種夢想，而在現在，這已不能算是夢想，因爲在我們現在，已出現了一種和大生產相關聯的、最不自私自利的無產階級，根據這階級和全體中國人民結合的能力和智慧，和全

體中國勞動人民結合的能力和智慧，是能經過一定歷史的必經步驟，按照一定的歷史條件，而成爲社會的公開主人，並去組織這樣的社會的。關於大同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理想，一旦和這階級相結合，並依靠於這階級的時候，這就成爲科學的思想，這就成爲實在可能的了。

應當不應當把這種大同——共產主義制度當成我們民族最高的理想制度呢？應當不應當最後的向這種制度努力呢？應當的。因爲這是合乎全體中國人民最高的利益，是合乎全民族最後的利益，在這種制度下，一切奴役、剝削、束縛、偏私、饑餓，以及各種社會危機和流血的災難，將被一掃而空，這才是我們民族最後最徹底的解放，這怎樣不是我全民族最高的利益呢？這怎樣不值得我們全體中國人民的努力呢？

大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這對於我民族不是外來的東西，而是我們民族內部的歷史要求，是我們民族最終的展望，除了自私自利的人，誰也不會反對的。『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爲什麼要首先爲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制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覆是：走歷史必由之路』。

（毛澤東：『五四運動』）

我們現在的展望是爲着展開將來的展望。中國社會改造的第一步，是爲着接近於社會改造的第二步；改造的第一步越貫徹，則改造的第二步就更有望。我們

民族社會歷史是要發展的，停止發展就是中國人民的毀滅，而歷史發展却是在曲折地前進，一方面不會跳越必經的步驟，另一方面，則如水之就下，終將達到自己的目的。

六 民衆與英雄

我們的民族、國家是人民的，我們民族的歷史是人民的。但這不是說：我們這裏沒有英雄存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在政治、軍事、經濟、思想的各種範圍內，曾出現了不少的賢聖豪傑，或者成爲民族生存的靈魂，或者成爲領導歷史運動的巨匠。每一種社會歷史運動，每一種對外的民族鬥爭，或每一種學術思想的潮流，總有一種先知先覺的人物，站在歷史前頭，作爲人民的嚮導。而這種先知先覺的人物之所以能發生其一定的作用，必定是和一定的歷史要求相結合，必定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歷史基礎。其中成爲民族的『無價之寶』的，乃是真正和人民在一起的人物，這種人物爲人民而生，爲人民而死；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事業雖或失敗於一時，可是其所追求的民族、人民的事業在歷史上却永遠不死，而其聲名的榮耀，且久而彌光。這種人物，如墨子，如岳飛，如李秀成，如孫中山，如李大釗，算是其犖犖大者。歷代陣莽英雄，近代革命志士，

許許多多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人物，他們爲人民、民族的利益，蹈湯赴火，視死如歸，而中華民族的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復振，亡而復存，正是受他們之賜的。

『詩經』上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這是真理。南宋的殺害岳飛父子，喪失天下士氣，明末的誅戮東林黨人，使天下的善類幾空，結果都是召了宋、明亡於異族的慘禍。清代的撲滅太平天國革命，囚殺志士，結果都是增加了外患和失地喪師，引起了當時中國被瓜分的危險。袁世凱的誅殺黨人，結果鑄成了五七的國恥。一九二七年革命陣線分裂之後，萬千熱血革命青年和工農先鋒慘受囚殺的荼毒，結果使日寇乘機而入，而有空前未有的民族大災難。這一切是無可爭辯的歷史，而這一切歷史證明了：我們民族是需要志士仁人，需要民衆英雄，有這樣的人，我們民族將興，去掉這樣的人，我們民族就會衰微和滅亡。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候，那時胡適還在青年時代，還未被腐敗的氣氛所傳染，還是有同情革命的心情，他就這樣寫過：『……讀報記，（俄京）革命後，政府大赦黨人，其自西伯利亞赦歸者，蓋十萬人云。夫放逐十萬男女志士於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沙』之所以終倒也。然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挫折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未來所以未可限量也……』這些話完全是對的。列寧在追悼一個布爾塞維克英雄巴布希金被慘殺的時候，就這樣說：『……民衆的英雄是有的，這是像巴布希金一類的人。』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俄國人民也許要永遠成爲奴隸，成爲農奴。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俄國人民將從一切剝削中得到解放。」

在中國，只就十年來的短時間來說，爲革命，爲救亡，爲自由被誅戮慘殺而無悔的民衆英雄，何止十萬人之多？而十年來或數十年來堅苦奮鬥生存至今的志士，並合起新投入革命大軍中的志士，又何止十萬人之多？在『人之云亡』的方面，固然也說明了中國民族所以受苦受難的由來，而這些可歌可泣又悲又壯的事實，又正是說明了中國民族的前途未可限量。是的，民族的痛苦，革命的艱難，要求我們的志士還要更多些，還要更多些。同時，民族的痛苦，革命的艱難，又要求我們的志士還要更艱苦奮鬥，還要準備更持久的戰鬥，以求打破抗戰一切重疊的難關，以求打破抗戰後一切可能的重疊的新難關。

我們的志士，特別是我們許多新躍進戰鬥時代舞台上的青年，應該要立志成爲最好的民族英雄，成爲真正的民衆英雄，而且一定要成爲民衆的英雄，才能成爲最好的民族英雄，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如何才能成爲民衆的英雄呢？第一，就是：要能夠埋頭在民衆中間，和民衆在一起，在民衆中間活動，發展民衆的覺悟，幫助民衆組織起來，鼓舞民衆救國革命的積極性和自動性，不求聞達，但求民衆的事功。第二，就是：要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候，不走開民衆的隊伍，在決鬥的時候，站在民衆的前頭；要能隨時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在任何生死

關頭的時候，不動聲色，爲民衆的事業而見危授命。第三，就是：要能持久，不見異思遷，不因挫折而灰心；要能虛心聽取羣衆和同志的意見，觀察羣衆的情緒和各種形勢的變化；要能耐煩應付各種複雜的環境，隨時幫助民衆解決自己困難的問題。第四，就是：要能不爲任何功名利祿所引誘，不怕庸夫俗子的白眼和訕笑。中國民族需要無數這樣的英雄，中國民衆需要無數這樣的英雄。而這種人之所以稱爲民衆的英雄，不是因爲一年或兩年，而是因爲十年、數十年和終身獻身給民衆，獻身給民族一切解放的事業，獻身給人民一切解放的事業。

有無數的民衆英雄，我們民族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可以有辦法，任何困難的事情，都可迎刃而解。『「才難」和「人才決定一切」，這是古今中外共同公認的真理。……同時，實際的經驗證明：我有數千年歷史文化的偉大中華民族的兒女的才智能力，確不下於其他任何民族，而現在在我們偉大祖國懷抱裏，擁擁有各種各樣的人才。』（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惟其是『才難』，所以我們必要珍重一切的人才；惟其是『人才決定一切』，所以我們必要加緊發掘和鍛鍊一切的人才，而這種人才首先要能成爲民衆的英雄。只有民衆，乃是人才之無限的源泉。我們看見過有些人，當他和民衆在一起的時候，他是有能力的人才，可是當他一旦離開民衆或對民衆事業變節的時候，他就成爲行屍走肉，毫無用處的廢物了。

凡是毒殺人才，毒殺革命志士的，這就是對民族犯罪。凡是威脅利誘人才變節，威脅利誘革命志士變節的，這就是對民族犯罪。回憶過去的歷史，這點引起我們無限的沉痛。袁世凱在世的時候，是利用其地位以毒殺和威脅利誘的政策，而企圖一網打盡天下豪傑的。袁世凱的罪惡至今爲中國人民所不赦，而袁世凱雖死，其流毒還存在於人間。毒殺革命人才，「一摘使瓜少，再摘令瓜稀」，這種流毒是必須立即結束的了。威脅革命者變節，利誘革命者變節，這使得民族道德的藩籬爲之毀壞，造成民族人格的恥辱，這種流毒也無論如何不應再存在了。同時，全國的人才，有志的青年，警戒於環境誘惑的可怕，更必須隨時養成自己高尚的、純潔的和大義凜然的人格，對於那種威脅利誘的流毒，必須仍有無限的警惕。我們要有志氣！我們要至大至剛！我們的格言，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朱註：「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

我門須知：全中華民族人民的一切解放事業，是要由我們的兩肩來担戴的。俗語說得好：「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的受苦，我們的犧牲，就是爲的我們萬世子孫的幸福。我們個人生命和人民的生命比較起來，只是一刹那而已，把有限的個人生命，服從於悠久的人民生命，這是我們生命的義務，也是我們生命

的崇高。

第四章 近代中國人應有的哲學觀念和道德觀念

一 爲公的哲學代替爲私的哲學

中國舊時有一種哲學，以「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大學』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認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修身乃是「九經」之首。在實質上，這是由私到公的哲學，也就是爲私的哲學。但現代中國人是需要由公到私的哲學，也就是爲公的哲學。現代中國人是處在世界最偉大最寬廣的時代，而現代中國人自己也正是一個最偉大、最寬廣的繼往和開來的一代。現代中國人是處在生死存亡鬥爭最劇烈的大時代，同時也是處在必須趕上世界的前頭，和世界最先進的民族並駕齊驅及攜手前進的大時代。現代中國人的眼界比過去中國人的眼界是寬廣的多了，而且應該要寬廣得多，否則，就不能最後轉弱爲強，就不能真正擺脫自己的落後。

現代中國人的新人生觀，應該是以「治國」、「平天下」爲「修身」、「齊家」的出發點。當然，現代中國人關於「國」，關於「天下」的眼界是和從前不同的。現代中國人所了解的「國」，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民族與國家；現代中國人所了解的「天下」，是整個的世界。新人生觀，應該在一方面以抗戰建國及全體中國人民獲得最後解放，爲修身齊家的基礎；在另一方面，則以抗戰建國及全體中國人民獲得最後解放，爲「平天下」的前提，而這所謂「平天下」，決不是要以中國民族征服別民族，而是和世界各民族平等攜手，實現世界各民族間的大同。

「治國」成爲修身齊家及平天下的關鍵。目前殘酷的現實，已迫得普通中國人都了解了這樣的真理：國如被滅亡，身家就是不保的。中國人已在從狹小的身家觀念中解放出來。事實證明了：以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這乃是顛倒的觀點。事實在號召着中國人要離開自己的家庭，犧牲自己的身體，以從事保國衛民的事業。事實也證明了：每個民族獲得獨立自由，並更進而使每個民族的人民獲得合理的生存，這乃是平天下的道路。

不是說，現在只要管「治國」，而不用「修身」，也不用「齊家」；也不是說，現在只要管「治國」，而不用開闢平天下。我們是說，修身、齊家，應該服從於抗戰建國及全體中國人民獲得最後解放和幸福的事業和利益，應該根據抗戰建國及全體中國人民獲得最後解放和幸福，作爲每一個中國人修身、齊家的準

繩。我們是說，如果存在着民族的壓迫和存在着民族中不合理的壓迫生活，則世界大同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却不能從世界孤立起來，而且必須聯合世界上一切反侵略的力量，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人類。

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態度，是修身、齊家的實際試驗石。不能以抗戰最後勝利和全民族大多數人的利益作爲自己利益的人，一定不能有合理的修身與齊家。而且，如果民族不能獲得獨立以至最後的解放，如果在異民族的蹂躪下和不合理的制度下，要普遍建立起關於修身、齊家之最合理的生活，則是不可能的。

同時，不以全體人民和全體人類的利益爲利益的人，正是既不能真正『治國』，又不能『平天下』；國家、天下的一切災難，就是因爲這類的人，這類的人，在古今中外，都是少數的人，他們假冒是國家、天下的代表，自以爲是國家、天下的主人（如日本法西斯蒂軍閥認爲他們是日本國家和東亞乃至全世界的代表和主人），把絕對大多數人作爲奴婢牛馬；在強國中，這類的人就要侵凌滅亡弱國（如日寇的進攻中國），在弱國中，這類的人就會在一定的機會中，爲自私自利所蒙蔽，而公然出賣自己的國家（如汪精衛的公開投降日寇）。這種極端自私自利的少數人，時常就是禍害國家和荼毒天下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新的哲學。這個哲學的立腳點，是中國人民，是民衆、

尤其是中國從事勞動的絕大多數人；也正是如此，所以這哲學是爲公的哲學，是最美滿、最真正能代表民族、人民利益的哲學。

因爲我們這爲公的新哲學是以中國人民爲本體，尤其是以中國勞動人民爲本體，是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相一致，是以人民的利益來決定個人的利益，是以公的利益來決定私的利益，是以多數人來決定少數人，所以這哲學是現實的哲學，是唯物論的哲學。

因爲我們這爲公的哲學把我們民族的歷史看成是發展的，是認爲我們民族的社會生活必須是發展的，我們民族才能生存，才能有力量，是認爲發展乃是從舊的東西中不斷產生出新的東西，是認爲任何東西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繼往（同時是對於舊的否定），也必有其開來（從其矛盾中產生出新的否定），所以這哲學是動的哲學，是辯證法的哲學。

關於唯物論思想和辯證法思想，曾是我們民族最好的先哲散見過的思想因素，而且我們的一些先哲也曾發見過某些歷史唯物論的思想因素，這一切的思想因素是我們舊有哲學最深湛的精華。我們現在這新哲學是在集合過去我們民族這些思想優秀的傳統，和吸收世界最新哲學思想的大成，而創造爲我們民族中最新的哲學，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哲學，而同時又是真正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哲學。

我們這哲學的創造，是我們民族真實生活的反映，是我們民族歷史運動的反

映，是在我們近代民族新人類——最沒有自私自利，最能爲民族一切解放鬥爭貫徹到底，能爲民族建設最偉大事業和建設最合理生活的中國無產階級——的基礎上，是在我們近代民族歷史運動實際經驗的基礎上，對於我們民族歷史運動給以一種纏結。這哲學是只有中國無產階級才能真正提出來，而是能真正把握歷史真理，民族生活，並貫徹代表中國一切最好最高的利益之哲學。

我們這爲公的哲學，是救國、救世、救民的哲學，這哲學應成爲中國人救國、救世、救自己的思想武器，使中國人能從鬼神的迷信、從真命天子的迷信、從聽天由命的宇宙觀人生觀解放出來，使中國人能養成一種自覺的、發現自己的、人定勝天的、戰鬥的宇宙觀人生觀，以提高自己戰鬥的意志，以展開革命和建設的眼界，使中國人都能這樣相信自己：他們是不能被屈服的，他們將戰勝頑強的日寇，他們將征服一切黑暗，他們將聯合世界上一切光明的力量戰勝全世界。

我們這爲公的哲學不是獨斷，不是教條；反之，這哲學却只能在反對獨斷反對教條的過程中建立起來。我們這哲學主張每個人需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生活，才能獲得最合理的、最合乎真理的思想。因此，我們這哲學又是啓蒙的哲學，是思想大解放的哲學，這哲學主張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所謂思想的自由，就是說：應該廢止思想上外來的權威，思想應該從外來的權威獨立起來；一切關於思想外來的錄鏽（物質的錄鏽）都不應存在。所謂自由的思想，就是說：應該

喚起每人的自覺；每人都應當思想，都應當對於所遇見的任何事物，從事批判，每人都應當擺脫傳統教條的束縛（精神的鏡鑿），從事發現自己的真理」。《拙作：「再論新啓蒙運動」》在事實上，新啓蒙運動是在我國文化運動中劃出一個新時代，而我們這爲公的新哲學，就是新啓蒙運動的中心旗幟。

這爲公的新哲學是從事中國革命的哲學，是從事中國新建設的哲學，因而這哲學必要無情反對一切賣國殃民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必要糾正一切墮落腐敗、自私自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第一：反對一切漢奸響應日寇主張所謂「東亞新秩序」、承認「日滿支」共同體和所謂「共同防共」的超越民族的謊謬思想、謊謬言論，這種極下流污穢的漢奸謊謬言論，謊謬思想，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國家獻給仇敵；反對一切破壞抗戰、破壞團結、製造磨擦、主張妥協投降的謊謬言論、荒謬思想，這種荒謬言論荒謬思想是爲日寇聲援，給日寇滅華開方便的道路；而在這些方面，首先就是要反對汪派、託派及各種投降派，這些傢伙是善於製造各種下流的詭辯和破壞行動以効勞日寇的。第二：要糾正一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要糾正那口背三民主義，實際反三民主義，那對於三民主義的陽奉陰違；要糾正一切反勞動人民的思想，這種反勞動人民的思想，就是反國本（反民爲邦本）的思想，就是反民族反國家的思想；要糾正那一切企圖把三民主義解釋爲反共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的陰謀；「孫中山先生明明白白的指示過：「馬克

思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現在這些人違背孫先生的指示，說兩個主義不是好朋友，這是反對統一戰線的思想，這是反對全國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人民的思想，也就是反民族的思想。」（毛澤東：「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第三：要糾正一切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思想。第四：要糾正利用抗戰形勢從事發國難財，陰謀妥協投降或吞併異己的思想。第五：要糾正一切依賴外力的空想空論，要糾正一切響應汪派託派鼓吹德意路線，並為日寇幫兇——希特勒、莫索里尼捧場的思想。第六：要糾正一切關於復古、迷信、獨斷的主張，要糾正一切關於抑止人民智慧發展的各種有害民族利益和抗戰利益的企圖。

總之，這為公的哲學，一切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為前提，一切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貫徹實現為自己的出發點，所以，一方面揚善，另一方面，也不隱惡；所以，一方面與人為善，另一方面也不同流合污；同時，這哲學如不是依靠於中國勞動階級，如不與人民大眾在實際上相結合，就不能有這些立場，而且也不會有這完整的哲學。

二 為公的道德代替為私的道德

我們新人生觀同樣把道德看成是和人民大眾相結合的道德。民族新道德是服

從於歷史的道德，是服從於民族解放鬥爭的道德，是服從於人民大眾利益的道德。

服從於民族解放鬥爭的道德與服從於人民大眾利益的道德，二者是統一的，因為民族是人民的，而民族的解放也依靠人民。

一方面，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另一方面對人民行其至仁，對人民行其大義；這二者互為表裏。

是否能貫徹到底，『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要看是否能『對人民盡其至仁，對人民行其大義』。

道德關於忠孝之『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於少數與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於仁義也是一樣，有益於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為，謂之仁；處理關係於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而得其當，謂之義。漢奸、汪派、託派等輩之所以成爲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叛逆，就是因爲它們只顧少數人的私利，拋棄了全民族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中共中央爲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同志書』）

惟其是以民族大多數人的利益爲忠孝仁義的道德標準，這忠孝仁義的道德，才不是抽象的、架空的东西，才有其真實的基礎，而這個標準，不是根據其口頭上，而是根據其實際行爲上，根據其在實踐行爲上表示其對於大多數人的忠孝仁義

的真實態度。

不能在實踐行爲上和民族大多數人在一起，或扶助民族大多數人起來爲民族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的人，那他對於忠孝仁義的道德，不管其口頭上如何，他還不是真正履行忠孝仁義的道德。

所以說，民族大多數人的利益爲忠孝仁義的標準，而實踐行爲尤其是這標準的標準。

所以說，言行一致的道德是最高的道德，言行一致的道德同時是一切道德的標準。

俗語說：「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這就是指那些能談而不能行的人。

俗語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就是指那些在實際行爲上所表現的道德，才是真實的道德。

關於這種民族新道德，是在近代中國民族歷史運動的基礎上，對於舊道德的改造和擴充。必要是對於民族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到底、奮鬥到死的，才是真正的忠孝仁義；像過去的那種盲從個人，以從事壓迫民族解放事業，壓迫人民解放事業的，並不是真正的忠孝仁義，而是對民族人民犯罪。必要是盡忠革命，戮力報國，保衛祖宗艱難締造經營的河山，謀萬世子孫的蘇延和自由繁盛的，才是真

正的孝子賢孫，同時，也是大忠、大仁、大義；像過去那種只顧自己小家庭或家庭中某些個人狹小淺見的利益，對於民族人民解放事業不關痛癢，甚至某些少數人，因此樂於犧牲民族人民解放事業的，既不是盡孝，又不是盡忠、盡仁、盡義，而是對民族、人民犯罪。

我們盡忠，是為創造民族、社會和最大多數人的自由幸福；我們盡孝，是為創造民族、社會的合理生活，並從而建立家庭中真正快樂合理的生活。我們愛祖國，愛民族，愛人民，同時也敬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愛護自己的兒女，而我們關於這些道德的一切出發點，就是由大我到小我，由集體到個人，由公益到私益。

道德所加於人民的，不是刺刀，而是善政。

道德所加於人民的，不是壓迫，而是自由。

道德的力量是在於使人在保衛祖國的事業上，或任何人民解放事業上，感到「莫辱於偷生，莫榮於敢死」，而自願地蹈湯赴火。

道德的力量是在使人中心悅而誠服，把痛苦當成愉快，把艱難當成坦途。

這樣，在現在，我們民族的新道德，一方面是在於抵抗日寇到底，打到鴨綠江邊，沒有中途妥協投降之餘地；另一方面則是在自己的人民中，必要關心努力善政，在一切可能和抗戰的需要上，使人民獲得自由，與人民共自由。

這樣，在現在，我們民族的新道德，一方面要對於一切賣國漢奸、投降份子以及一切從事挑撥離間的民族散類，加以不姑息的裁判；另一方面，則對於一切抗日力量必要和衷共濟，對於全國人民必要努力用一切方法啓發他們的覺醒，發展他們關於抗日救國和征服困難的自動性。

現在有些人一方面提倡民族道德，提倡節義，另一方面對於那曾出賣朋友，出賣過人頭的變節漢（如葉青之流），却加以獎勵和提拔，這真是不可解的。

現在有些人一方面號召人民對國家民族盡忠盡義，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在民衆中埋頭苦幹去發展民衆保衛祖國自動性的愛國志士，却加以阻礙和破壞，甚至加以殘害，這真是不可解的。

要發揚民族道德，要把關於民族道德的空言變成實際，就必要糾正上述矛盾的現象。反之，就是違反民族道德的。

關於我們民族的新道德的最後一句話：最偉大的民族道德力量，必將是在全國人民的集體力量中才能表現得出來。

第五章 結論

集體努力和艱苦奮鬥決定中國的歷史

集體努力和艱苦奮鬥，將決定中國的歷史。這就是實踐的問題。實踐才能決定歷史。

全民族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同時，全民族要有「堅苦奮鬥的工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面，祇有在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中，才能實現出來；同時，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必要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相結合，才能獲得光明的結果。

沒有集體努力，中國抗戰不能得到最後勝利，人民解放事業不能成功；沒有艱苦奮鬥，同樣地是如此。關於這些，事實上在上面都已說到了，或在各方面詳細說到了，然而在結論上，還是應該反覆地提出來。

集體努力依賴於民主。艱苦奮鬥依賴於克己。而在事實上，集體努力與堅苦

奮鬥，二者又是互相關聯的。所謂集體努力，就是說，必要和全國人民在一起；而艱苦奮鬥，如不是與人民在一起，如與人民相疏遠，如在人民面前自視有優越感，那就是不可能的。同時，真正能和全國人民在一起的，那他也就必會樂於克己，樂於去掉『醉生夢死』和『驕奢淫佚』的惡習，因為他會覺得在羣衆面前，這種生活乃是一種恥辱；因為他會知道這種生活是不能接近羣衆，不能和羣衆共處，不能取得羣衆的信任；因為他將會被羣衆所同化。

中國人民本來是善於吃苦耐勞的人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勞動男女，時常能在艱苦災難之中，臥薪嘗胆，自強不息，而關於醉生夢死一切驕奢淫佚的惡習，他們本來是沒有份的。這種刻苦耐勞的特點，以近代中國無產者爲其卓絕的代表，而十幾年來的歷史恰是這樣證明：中國無產階級黨人就是他最善於發揮中國民族和中國無產階級這種卓絕的作風的。在今天，中國無產者及中國共產主義者這種作風，正應爲一切社會階層所取法，並應浸透於每個中國人的人心，從每個中國人自己的行動上體現出來。中國無產階級黨人這種作風的歷史，同時又告訴了每個中國人，他們之所以能夠養成那種艱苦卓絕的作風，就是因為他們是和民衆在一起，就是因爲和廣大民衆在一起爲集體的 effort；也正是如此，所以，有些別階級的份子同情於無產階級的事業而投到無產黨中，也能在民衆的集體洪爐中，消磨每個人的私心，消磨每個人舊的不良習慣，而使自己能死心塌地願爲歷

史的光明去受苦受難。

從此可知，不是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條件下，都能持久而腳踏實地養成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的。任何人，如離開民衆的條件，則關於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就可能流爲空談，而不能成爲實際；而關於這點，歷史的證明，也正是很多的。

從此可知，把中國看成是全體中國人所共有的，容納一切人，動員一切人來共同救國，『聞善言則拜』，『聞過則喜』——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如『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所提出的『醉生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奮發蓬勃之朝氣必須養成；苟且偷生之習性必須革除，自私自利的企圖必須打破』，二者乃是互相表裏；缺其一方面，也就會沒有另一方面。

從此可知，在今天，要用各種力量 and 各種方法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同時這些問題又正是在反覆證明這個真理：『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之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去啓發各種戰勝敵人的力量 and 各種克服困難的方法，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有完滿至善的集體努力和艱苦奮鬥。而這樣的結果，就是：『把日本侵略者置之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好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一聲喚也要把他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以上括弧內引文，見毛澤東：『論持久戰』）

這裏有我們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唯一可能的道路。

這裏也有我們爭取人民最後解放直到建設大同世界之唯一可能的道路。

你是那一國人？

我是中國人。

你所衣、食、住的國土是什麼地方？

我所衣、食、住的國土，西起葱嶺，東止鴨綠江。

誰是你們國家的當然主人翁？

我們全體中國的人民。

你們現在遇到什麼災難？

我們民族現在遇到日寇侵略的災難。

你們抵抗到底嗎？你們打到那裏為止？

我們要抵抗到底，反對一切妥協投降，打到鴨綠江邊。

你們依靠的什麼力量？

我們依靠最廣大的人民。

你們抗戰後將建立一個什麼新中國？

我們將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還要更邁步走進

大同的世界。

什麼是大同的世界？

那就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每個人都可以過極富裕快樂的生活，每個人都得真正自由廣大發展自己的天才和個性，而再沒有民族隔閡和仇恨（在其他民族都同樣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這樣的世界。

怎樣能夠達到這樣的世界？

我們還是依靠中國人民大眾的力量，依靠中國無產者和一切人民聯合的力量。要達到這樣的社會，需要經過一些必經的階段，而在現在，我們的號召，就是：

『為祖國生命而戰！

為民族生存而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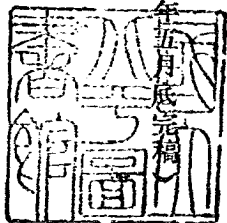
為國家獨立而戰！

為領土完整而戰！

為人權自由而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底完稿



抗戰中新人生觀的創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陳伯達

發行者 晨光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再版

750
923